

中国话语与国际关系

第

十

二

辑

中文社会科学索引 (CSSCI) 来源集刊

复旦国际关系评论

中国话语与国际关系

中文社会科学索引 (CSSCI) 来源集刊

第
十
二
辑

复旦国际关系评论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话语与国际关系/苏长和主编.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复旦国际关系评论. 第12辑)

ISBN 978-7-208-11822-5

I. ①中… II. ①苏… III. ①国际关系—研究②中外关系—研究 IV. ①D81②D8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46216号

责任编辑 赵荔红

封面装帧 楚 门

· 复旦国际关系评论 第十二辑 ·

中国话语与国际关系

苏长和 主编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19.5 插页 4 字数 295,000

2013年11月第1版 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11822-5/D·2364

定价 40.00 元

《复旦国际关系评论》第十二辑 / 2013 年

FUD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12/2013

主办单位：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主编：苏长和 俞沂暄

学术委员会（以姓氏拼音或字母排序）

Callahan, William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樊勇明 复旦大学

冯绍雷 华东师范大学

黄仁伟 上海社科院

金灿荣 中国人民大学

Lampton, David 美国霍布金斯大学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秦亚青 外交学院

沈丁立 复旦大学

石之瑜 台湾大学

Telò, Mario 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 (ULB)

王正毅 北京大学

杨洁勉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

郑在浩 韩国首尔国立大学

Zweig, David 香港科技大学

编辑委员会（以姓氏拼音排序）

白沙天 包霞琴 薄 燕 陈玉聘 陈志敏 何佩群 黄 河 蒋昌健

秦 倩 沈 逸 吴澄秋 肖佳灵 徐以骅 俞沂暄 袁建华 张 骥

目 录

学术自觉与社会科学自主创新 /苏长和 1

天下为公的政治哲学：一种中国式的世界主义理念

/陈玉聘 王 欣 12

建构中国的安全政治话语：文化、演变和社会实践 /刘永涛 35

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中国的理论与实践 /韦宗友 54

关于中国发展中国家身份的探讨 /俞沂暄 87

中国式话语与国际话语权

——以外宣翻译中的中国特色词为例 /翟石磊 108

中国外交话语社会化：基于上海外国留学生的研究 /叶淑兰 140

民生先导还是民主先导？

——从对非援助看中国的援助外交 /陈水胜 席桂桂 174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与中国环境外交话语 /薄 燕 192

“建设性介入”与“负责任的保护”

——中国参与国际人道主义干预规范构建的新迹象 /陈 拯 218

国际政治中的国家学习机制与话语建构：中国能源安全观念的

绿化及其对能源和气候外交的影响 /李昕蕾 243

国际人道主义援助：中国建设道德化国际社会的政治空间

/燕玉叶 290

学术自觉与社会科学自主创新^{*}

苏长和^{**}

【内容提要】 世界上不是所有国家都能够拥有自己的社会科学体系的,文明自治的大国应当从文化主权高度重视独立的社会科学体系建设。文章从研究的选题、使用的概念、文献保护以及价值立场几个角度阐述了学术自觉与学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对学术主体性的重视并不是要回到学术民族主义,而是强调在中外平等交流中,尤其是在了解中外的基础上逐步确立自己社会科学体系在世界的地位。

【Abstract】 There is no but coherent and consistent civilization country has the possibility to build its independent social science system. The country only with independent social science system could play the leading role in the world stage. This essay elaborates the importance of research agenda, fundamental concepts, literature reserve, and value standing point to current Chinese social science innovations. It doesn't mean that the building of social science system could emerge in a closed situation, on the contrary, it stresses it must be reached in a intense interaction with the rest academic world.

^{*} 本文为作者在上海国际关系学会 2011 年 11 月 28 日年终大会发言稿基础上扩充而成,是作者撰写的《国际政治生态观察笔记》的一部分。改定于 2013 年国庆。

^{**} 苏长和,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外交学系教授。

他们在幻象、观念、教条和臆想的存在物的枷锁下日渐萎靡消沉,我们要把他们从中解放出来。……有一个好汉忽然想到,人们之所以溺死,是因为他们被重力思想迷住了。如果他们从头脑中抛掉这个观念,比方说,宣称它是迷信观念,是宗教观念,他们就会避免任何溺死的危险。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第509—510页。

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政罗教网无羁绊;巩固学校,维护国家,先忧后乐交相勉。

——复旦校歌

一、引言

独立的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在国家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和意识形态安全中扮演重要作用。一个大国,若无独立的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则其意识形态安全就会很脆弱,缺乏防御,容易为外界渗透和改变,失去发展所需要的良好理论与舆论环境。有人说,如果没有自己的理论,那么,就会成为别人的奴隶,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改革开放以来,包括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在内的社会科学在中国取得了较快的发展,但同时原创性的自主创新成果并不多。在引进西方尤其是英美学术成果方面可谓突飞猛进,但是能够与别人展开平等学术对话的成果并不多,且这一趋势短期看不到改观的迹象。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是在交流中失去了学术独立性和学术主体性,尤其是学术生产大多掉进了别人的概念框架下,为别人打工,忙着用自己的经验去验证别人的理论,不是说所有,至少相当一部分成果成了别人学术体系的陪衬和附庸,让人忧虑。

我们在自由思想的时候,如果缺少主体和自觉意识,很有可能在成为别人思想的奴隶的时候,没有自知,不能自拔,甚至还认为自己在“自由”、“独立”地思考。“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确如复旦校歌所言,在于“巩固学校,维护国家”,两者缺一不可。近年来,随着国力成长的需要,比较政治学

这门分支学科开始在中国逐步兴盛起来,但观之发展态势,多为引进美国特色比较政治学概念体系和研究议程而已,如在起步之初或者发展当中,始终缺少建立自己比较政治学体系的主体性意识和雄心抱负,现在个别学科发展所遇到的在西方概念体系下打转的窘境,必也会成为将来中国比较政治学之现实。自省是为了少走弯路。学人面对一些学科现状不暇自省而后人省之,后人省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当下人们多在谈中国梦,自以为于学术而言,近代以来一代代中国知识分子,追寻的无非是在知识的自我更新中实现中国学术的独立梦,用中国话语构筑中国学术。大国之崛起,乃物力与思想之共同崛起也。崛起中的大国如没有一套成体系的理论解释自己以及解释自己与世界的关系,则难以让他人心服口服,更遑论推动国际知识格局的转移。从此意义上讲,保持强烈的主体性和察觉能力,不盲目排斥,在汲取古今中外一切优秀知识基础上而又不落入窠臼,且能做到青出于蓝,大国的学术才可能成就学术的大国,傲立于琼林。

二、研究的问题要有自觉

社会科学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和国家关怀。不同国家的学术议程受到发展阶段、发展道路以及民族性的影响,其所要解决的问题会有很大的不同。社会科学工作者需要自觉地立足于国情和民情,选择研究的问题和设计研究议程。

例如,美国作为一个粮食大国,颇重视如何将玉米转化为生物燃料并通过公共政策进行推广的研究,有的统计说美国 50% 的玉米被提炼成乙醇,以用作生物燃料。美国的国情决定其可以进行这项研究。这项研究饱受争议。想一想全世界那么多人挨饿吃不饱,食不果腹,如果其他还面临严峻粮食安全的国家的社会科学公共政策研究也学美国,将精力放在如何将玉米提炼的生物燃料进行政策推广上,而不是研究如何解决贫困和粮食安全问题,那么这样的研究对大多数还处于温饱、贫困、赤贫状态的国家人民来说,可能就是一项“有术无道”的研究。这种研究看上去可能是“创新”的,却是不人道的,失去了社会科学研究为人民服务、为人类服务的

基本宗旨。

在一个政治世界中,每个大国的学术研究都会带有时代特色、民族特色、国家特色。大国在其成长的不同阶段,需要回答的时代命题和解决的时代难题不同,往往会决定其社会科学的生态。德国在其立国过程中,不只是完成了工业立国,通过人文复兴,同时完成了精神立国。战后美国区域国别或比较政治研究兴盛,更多是满足美国维护其庞大海外利益的需求。因此,社会科学总要回应一个国家甚至人类的时代命题和时代难题,并在这一智力探索中,确立起一个又一个学派。

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必须要在“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上给出系统的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我们开展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基本价值前提。在选题和设计研究议程时,如果脱离这个大的价值前提,那么研究成果就会缺少国家建设的意义。例如,在如何提高中国国有企业效率问题研究上,一种研究取向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提倡的私有化,另外一种研究取向是在保证公有制主体地位不变的刚性约束下,在吸取人类先进管理模式基础上,提高国有企业效率和责任。第一种研究成果来源于私有制制度,其成果若逐步转化为公共政策,可能很危险,会动及我国根本。一些国家在转型阶段有过教训。其实,这类研究较为简单,只要直接将西方国家的概念拿过来套用和实践即可,且看上去挺美,有相当的迷惑性。第二种研究取向因为有刚性约束,所以研究者会很累,因为几无现成的理论与经验可参考,靠拿来已经不行了,只有在公有制主体不动摇的刚性约束下下工夫研究如何提高国有企业的效率和责任,但这种研究一旦成功,则是突破性的,为国家建设的贡献就很大,对他国国家建设也会有启发。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取得较大成功,是与坚持坚守这个刚性约束条件分不开的,它包含了中国人的创造性智慧和实践,很值得总结。

当代中国蕴藏着丰富的社会科学研究金矿。说中国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金矿,一是因为中国本身是个自洽的文明体,超大规模的国家,高度复杂化的社会;二是当代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实践,出现了许多西方既有社会科学理论体系解释不透、解释不了的谜题。这就需要我们自觉地将宝贵的财力和精力集中到对这些谜题的解答上,而不是削足适履、辛辛苦苦用中国的经验去为西方理论作注脚,或者刻舟求剑、简单通过西方经验来指导中国发展方向。比如,关于和谐世界与和平发展道路,就是个大命题。

中国的现代化为什么没有走对外殖民、军事掠夺和武力扩张的道路,就不仅是国际关系学者要研究的,其实,从中国的国家性质、政治制度、市场经济体制、法律体系等多个学科,都可以对这种实践给出有说服力的学理解释。只有对一个个根植于民族传统文化传统、经济脉动原理、社会管理机制、国家独特属性等谜题竞相给出解释来,我们自己的社会科学理论体系自然就会屹立于学林。

一种看法认为,过分专注于“中国特色”研究,会使自己的学术研究边缘化、孤立化,不便于国际交流,与“国际”学术无法兼容。其实,一个国家社会科学的国际化,首先是在立足研究自身或者以自身视角观察世界问题的基础上走向世界的。其社会科学——无论是对自身的研究或者对外部世界的研究,无不带有自己民族和文明特色。欧洲大陆和英美社会科学,是在自己历史、社会、文化经验基础上形成的,只不过随着其全球扩张,将这些带有自身特色的社会科学假以普遍性和终极性话语来叙述而已。其独特性所以能转化为普遍性,恰恰在于其坚守自己特色,并在这一前提下借助文化扩张战略以及培养大批说自己话的海外知识阶层有很大关系。因此,问题不在于专注于“中国特色”研究会使自己边缘化,问题在于国家要有系统的文化战略,有长远的战略耐心培养更多的外国学者利用中国特色概念来研究问题,当更多这些概念为通晓汉语的海外学者所接受和使用的时候,自身的社会科学体系就逐步具有普遍性的意义。

三、使用的概念要有自觉

运用什么概念开展研究很有讲究。概念是理论话语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西方社会科学中的绝大部分概念,都是从西方发展经验中提炼出来的,不能说它们的概念不可用,但是我们在使用时必须结合本土实际,自觉地进行辨析和鉴别,否则,囫圇吞枣拿来,既不能解释本土,对政策研究还会起误导作用;若全盘接受,则会直接对本国意识形态体系产生解构作用,对意识形态安全不利。

还是以贫困和饥荒问题为例。有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叫亚玛蒂尔·森,森认为导致贫困和饥荒的根源在于个人自由权利分配不当,或自

由权利不够,若分配得当,贫困和饥荒则会大大减少。言下之意,第三世界普遍的贫困和饥荒问题解决之道,应该是自由先行。这是基于第一代人权概念得出的研究结论。实际上,贫困和饥荒问题有复杂的国际结构因素。然而,如果按照森的概念指导第三世界国家社会建设和政治建设,在第三世界不切实际脱离国情地推广西方的自由民主理念,反而会加剧贫困和饥荒。“二战”以来第三世界已经有许多事例摆在那里。因此,要做到概念自觉,就需要超越森的自由先行概念,跳出第一代人权概念的陷阱,从第三代人权概念出发,研究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建设和政治建设,由此得出的研究结论,对第三世界国家政治发展可能更具实际指导意义。

现在社会学界流行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转变的社会管理研究,根据笔者观察,大部分研究都将精力放到陌生人社会管理研究上,并按照西方社会学思路,认为陌生人社会管理必须契约为重。这是西方工商社会发展的逻辑,冷冰冰的,没有温情,西方早已经对陌生人社会中的异化现象进行了反思,我们还顺着其概念来研究中国的社会建设,则必走弯路。中国的社会学家费孝通晚年提出另外一个概念,叫“拓展的熟人社会”,这个概念则大大突破了西方概念体系,既尊重和符合中国的实际,其实,对解释其他国家的社会建设也有借鉴意义。我们在社会建设上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和谐社会绝不是陌生人社会,应该是一种“拓展的熟人社会”,没有人情和温暖,光靠冷冰冰的契约,和谐社会则会缺少情感根基。

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如果用西方的霸权稳定论概念来解释中国崛起,则中国发展的逻辑结果是必霸必扩张。中国要走自己的民主政治发展道路,但如利用西方的选举概念研究中国并指导中国,则中国应走多党竞争、分权政治的道路;但是,如果我们用“选”、“举”结合的思维模式,我们则可提出与西方不同的“选”、“举”概念来。如此等等,不再一一列举。这么说来,囫圇吞枣地使用西方社会科学概念解释中国,确实很危险。问题是,现在一些公共政策研究下意识、不自觉地这么在做,这种研究一旦转化为政策,自然会对中国的政治发展道路产生潜移默化的消极影响。

概念自觉的核心,是警惕本国实践被别人概念来解释。一个大国如果过多迷信外人对自己历史的解释,精神必不能独立。近二十年来,西方

社会科学大举进入中国。西方社会科学的概念在中国很时髦很流行,似乎离开了西方社会科学的概念,中国就很难建立自己的社会理论体系一样。由于对西方社会科学概念甚至评价体系的过度依赖,使我们的一些社会科学知识生产处于国际知识生产的下游,专替别人传销和打工。一些社会科学工作者习惯了简单地引进西方概念解释中国问题的思维,而不是有鉴别地且从中国本土实践金矿中提炼概念。在近年比较热的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研究上,有的研究就简单利用西方概念,认为中国成功的政治经济学,就是所谓“专制加资本主义”,并用这两个概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进行偷梁换柱,甚至用“国家资本主义”概念来说中国,这无疑将中国道路中国制度讲歪了。总之,西方主流社会科学总是要将中国纳入其概念体系,成为被解释的对象,这是西方的中国学研究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我们跟着他们走,在西方的概念体系下打转,如丸之走盘,是难以走出自己的社会科学创新的大道来的。

当代中国研究不能成为别人概念解释和打扮的对象。我们中国学者研究当代中国,需要自觉地用中国的概念来研究,并敢于用中国的概念话语去讲世界故事。就社会科学而言,研究当代中国的核心线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核心概念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例如,前述有关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研究。周恩来早在1956年同巴基斯坦总理苏拉瓦底的会谈中,谈到中国和平共处与不对外扩张称霸问题上时,说中国不搞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并不是口头说说而已,根本原因是“被制度和政策限制住了”。前国务委员戴秉国在《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一文中也指出,中国“国强不霸”,走和平发展道路,是有制度保障的。那么,对我们研究者来说,就需要自觉研究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究竟如何保障着中国不对外搞霸权和殖民主义,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了,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和外交理论就会在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挺立起来。

有人可能会觉得,我们自己可供使用的概念很少。我觉得也不是,关键在于研究者要有心和有信,去发觉。比如,“和谐世界”是个充满东方智慧和哲学的概念,这是一个可以将人类秩序带到更高发展阶段的概念,其境界比自由民主的世界秩序观更高。再比如,中国人在探讨政治哲学问题时,有一个可以汲取的思想资源是“天下为公”这个概念。本质上,西方政治经济哲学包括世界秩序的核心是建立在“天下为私”的基础上的,而

东方的政治哲学始终强调“公”。人类走到今天,再循着“天下为私”这个逻辑走下去,后果不堪设想。完全按照“私”来指导人类实践,怕是个绝境。若我们将公私关系讲透,中国的政治哲学以及国际政治哲学的话语体系应会独立起来。再比如,从比较政治角度看,“党国体制”怕是现代国家最重要的一个特征,我们潜意识觉得似乎只有中国是党国体制,其他国家则不是。实际上,当今世界近200个国家,大多都可以用“党国体制”这个概念来进行分析,差别只在于组织方式和运行不同而已。这个概念用的好,会改变外国对中国共产党的刻板印象,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自然会更好地被外人理解和尊重,且对中国的比较政治学体系建立具有重要意义。这就是用中国概念讲世界故事的理论力量所在。

也有人会说,你这些概念只是自说自话,对外讲的时候别人根本听不懂,与“国际”学术话语不接轨,无法融通。其实未必如此,关键是要有信念、信心以及战略性步骤,通过国际学术研究和新闻媒体等国际文化交流方式,将其一步一步推广出去,这个过程可能需要一、二个世纪。以“党国体制”这个概念为例子,若我们有意识地选择一、二十个国家,让在华留学生与中国学者一起对当地国逐一研究,检验并完善这个概念,这个概念自然会逐步传播出去,从别人听不懂的概念变为别人理解甚至接受和使用的概念。美国立国时在国际缔约上采取“缔约”和“批准”的二阶段模式,导致当初其他所有国家在与美国签约时不得不处于“对自己生效的条约可能对美国并不生效”的尴尬境地,从而招来抵制不断。但是美国从来没有放弃对自己的制度信念,并最终使“缔约”—“批准”的二阶段模式成为国际通行模式。当初美国如果因为与“国际社会”不接轨就放弃该模式甚至改变自己的政治制度以适应欧洲,绝不会有后来的结果。这其中固然有美国国力上升为背景,但制度信念和耐心也是关键。

四、利用的材料和文献要有自觉

这个问题包括两部分。第一个问题涉及的是如何有鉴别地使用西方语言文献特别是英语文献;第二个问题是在研究过程中必须要尊重和保护本土文献。

在中国区域和国别研究中,一个比较流行的现象,是用西方主要是英语文献开展发展中国家研究。这种现象在其他学科中也较普遍。另外,媒体上很多关于发展中国家报道的图片和文字,甚至都是直接从英语媒体中拿来的,这些图片和文字虽不是全部,但相当部分背后是具有强烈的价值倾向和政治暗示的。优秀的英语文献我们必须参考,但是,若过度依赖、甚至盲目依赖,则不利于自主研究和独立判断。说到底,当别人给你西红柿和鸡蛋时,你只能做西红柿炒蛋这道菜,你不可能烧出其他菜来。据说,美国军方可以掌握 500 多种语言,美国可以为国民开设 200 多种外语课程,而中国能够开设的外语课程只有 50 种左右;目前全民只学英语,那些对国家利益具有战略性意义的小语种人才和文献资源严重匮乏,这种现象值得注意。现在,随着中国海外利益和海外权益的扩大和延伸,我们必须建立自己的区域和国别研究文献数据库,才能展开对所在国的独立分析;若光用英语材料来研究俄罗斯、德国、东南亚、中东等国家,必然会使自己的研究被别人牵着走。

材料和文献使用的自觉,还应该自信和自尊,去珍惜和保护本土科研文献。我们对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些重大观点是有发明权的。顾颉刚 1928 年就提出自下而上地研究历史,美国历史学家汤普森 1966 年才提出自下而上地研究历史,比顾颉刚晚了近四十年,但是国内学者每提到这一史学流派起源时,几乎只引用汤普森,而对本国的顾颉刚置若罔闻。对这次金融危机原因,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其实做过透彻的分析,国内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早在世纪初就对美国金融资本主义可能爆发的危机提出过警告,但是经济学学者在分析这次危机原因的时候,很多还是只引克鲁格曼而不引中国学者的。

有人说“灭国先灭史”,这个“史”,其实很重要的部分说的是一国一民族通过文献保留下来的记忆。这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借助文字、音像等方式一代代传延,才能沉积为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财富;一旦流失或者中断,后人将不知自己从何方来。这是很可怕的。一些文明古国的中断,其后来居住的人为了接上历史,不得不借助他国保存的该国史料来承续,应该引以为戒。我们现在一些优秀的科学技术成果都在英文期刊上发表,这种现象短期看是提高国际影响力,长期看,则弊大于利,设想几百年后,我们可能会渐失学术语言的主权,我们后人书写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时候,将不得

不在英文期刊而非汉语文献中进行耙梳整理,那样的话,体面何来!尊严何在!陈寅恪在讲到中国敦煌研究时,一声长叹:“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他说的是敦煌文物被偷窃到国外,导致中国学者研究敦煌得不到国外找资料的殆失自尊的惨淡景象。此言对我们今天的科研工作者甚至管理者来说,值得省思。

前面提到社会科学的一大功能是构建国家的意识形态,促进国家建设。中国现在重视抢救和整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史料和文献,这些史料和文献还需要更多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去使用,将其用活,否则,其价值也会打折扣。另外,社会科学要研究中国道路中国制度,无论如何都必须研究中国共产党。但是现在有种现象让人担忧,就是除了做党史国史研究的以外,党史国史的文献并不被搞社会科学研究的人重视,被引的频次在相对下降。这种现象产生的消极后果短期看不出来,但是二十年五十年后就会显现出来,因此应该引起管理者及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重视。

总之,保护本土文献资源,应该上升到国家文化主权的高度去看。这绝不是搞学术封闭,也不是学术民族主义。于民寡体小的国家来说,其无能力构建独立的社会科学体系,似只有尾随和依附,但对文明连贯、制度自洽、文字独立、人口庞大的国家而言,不珍惜不维护本土文献,则必在社会科学研究上受制于人。

五、研究的立场要有自觉

自然科学可以没有国界,但社会科学一定是有国界的,这是由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决定的,由此也决定社会科学工作者总是有国界和立场的。

一些社会科学研究者喜欢谈价值中立。其实,任何社会科学研究都是有历史观和价值观的,没有历史观和价值指导的社会科学研究,就会失去“意义”二字。说到底,这个世界只要有政治的地方,就一定要价值。所谓中立和客观,说的是研究者不要过多地将个人感情因素带到研究过程中,不爱屋及乌,也不恶其余胥,以免影响对研究对象的判断,而不是不带历史观和价值观研究问题。比如我们研究日本,就不能因为研究者个人对日本的好恶而使研究的结论也跟着好恶走,因为不喜欢日本或者特别

喜欢日本,就将这种喜欢或者不喜欢带到对日本的客观判断中。西方许多学者研究中国,先入为主地对中国共产党下负面判断,所以它们对当代中国研究不客观,对中国的研判常常失误,其失误性的判断转化为政策有时反而会帮我们的忙。现在,西方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偏见给他们研究带来的局限,开始逐步客观地评价中国共产党。我们研究西方,也不能因为其与我们制度的不同,就感情用事将其一切往坏里说,那样势必也会影响我们对西方走势的判断,得出的结论就会偏颇,以此拟订内政外交政策,也会出问题。

但这并不意味着放弃历史观和价值观指导开展研究,或者看待研究。没有一定的历史观和价值观为指导,一些社会科学研究结论必定会出格。历史观是告诉“我们怎么来的,向什么方向去”这样的问题。例如,美洲大陆印第安人的灭绝是与西方殖民者的入侵和屠杀直接相关。这是种族灭绝,或者种族屠杀或者反人类罪。但是,新近的环境史和疾病史研究则不大谈这点,大谈西方人到达美洲大陆后带来了各种病菌,导致印第安人人口的急剧减少。后一种研究就违背了基本的历史观,是在间接为殖民迫害史、种族灭绝史开脱罪行。在中国,有人认为圆明园被毁是中国人自己干的,英法联军的破坏甚至还没有中国人自己对圆明园的破坏大。最近甚至有种看法,认为中国要成为世界大国,必须放弃自己在国民中进行百年屈辱史教育,认为讲多了会在成长为世界大国时有精神负担。这种研究也是没有立场和历史观的。像这类为殖民者、入侵者开脱罪行的研究有不少,就不一一列举了。任何一个有良心的社会科学学者,若不敢正视或者淡忘几百年殖民史侵略史给人类带来的莫大灾难,其在看人类未来的时候,必也缺乏公允和坦荡。

任何国家的社会科学,最终必定是要为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服务的,在此基础上有余力,进而兼济人类和天下。对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而言,其历史观和价值观应该自觉地与我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宏大主题凝聚在一起。在这个大主题下,研究成果在为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利益服务过程中,才会产生尊严和骄傲,才能真正赢得世界的尊重!

天下为公的政治哲学： 一种中国式的世界主义理念

陈玉聘 王 欣**

【内容提要】 根植于西方近代政治哲学的国际关系理论，往往将国家界定为理性的“经济人”，以追逐私利作为国际关系的常态，但追本溯源，这种观念只是伸张了西方思想传统的一个方面。相比之下，中国人则更加注重“天下为公”，但这也并非与整个西方传统截然不同；“天下为公”这一观念可以作为一种思想源泉，以西方传统的世界主义为桥梁，形成某种新的“世界”理念。其中，以“仁”贯穿始终的“家国天下”的差序推演，是“天下”政治共同体观念的构成基础；以“责任的分配”为导向的“为公”伦理，既是对个体行为者的要求，也可以成为国际社会和谐的基础。在世界主义的平台上，中国和西方的思想传统共享着某些核心价值，所不同的只是中国主张“仁”而西方秉执“理性”，两者并非不可通约，而正可以互为补充，使中国的思想为世界作出独特之贡献。

【Abstract】 Contemporary IR theories, which are based on modern Western political philosophy, always define nation-state as rational “economic man”, and see the pursuit of self-interest as the normal condi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owever, this idea is no more than just one aspect of the Western tradition. Chinese’s emphasis on the Universe and public is therefore not contrary to the entire Western thought. Such a concept, through the medium of traditional Western cosmopolitanism, may create a new idea of the world. The concentric circles governed by the principle of “Ren” (benevolence or conscience) are the basis of a “universal political community” conception, and the “for all in the world” ethics oriented by the “distribution of responsibility” does not only guide individual behaviors, but also serves as the foundation of international harmony. The Chinese and Western traditions share some core values on the platform of cosmopolitanism. While they focus respectively on “Ren” and “Reason”, the two traditions are not incommensurable.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m makes possible China’s intellectual contribution to the world.

** 陈玉聘，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系讲师；王欣，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2010级硕士研究生。